

以反贫困视角重思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周露平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旨趣与终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思想与其他思想的本质区别。纵观马克思思想,反贫困议题深嵌人类解放考察之中,共同建构了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容。就问题的起源来讲,现代性解放作为现代资产阶级话语,彰显出反抗传统封建社会的基本诉求与斗争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诉求与归宿,却导致了庞大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现实。就解决的效果而言,现代贫困问题的顽疾直接证实,资本主义运动并非人类解放的最终前景。故需以反贫困为视角剖析四对贫困内容,重新思考资本批判与人类解放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反贫困;人类解放;资本批判;经济哲学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2.003

就问题的起源来讲,现代性解放作为现代资产阶级话语,彰显出反抗传统封建社会的基本诉求与斗争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导致难以克服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现实。因此,当弗朗西斯·福山试图以资本运动作为历史蓝图,终结任何企图超越的论断,无疑是错误与可笑的。换言之,在贫困现实的历史巨幕中,现代资产阶级并未带来人类解放的终极许诺,反而成为充满矛盾冲突的乌托邦幻象。

就解决的效果而言,面对人类解放问题,已有的研究进路主要聚焦诸如,社会制度改造与人类解放的成型、生产力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形成、生产关系变革与人类解放的塑造、社会形态变迁与人类解放的确立等。这些讨论有共性倾向:以一种“应然性”的方式,如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来规定社会运行机制的“实然”,但问题在于人类解放如何从人类生产世界自我生成出解放之路径且展示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图景。这是理论研究缺失的重要一环,容易走向一种所谓批判的无批判之路。

故纵观两种进路可以发现,人类解放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旨趣与终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的本质内容。贯彻人类发展史的贫困议题恰恰证实了人类解放、资本批判与社会变革之间的本质关系。有一种误解似乎难以消除: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变成危机的“警告”与“提

作者简介:周露平,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与实践论域”(22FZXB003)的阶段性成果。

示”,而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辩护话语之内。

事实上是这样吗?我们以为,当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问题提升至社会批判时,则将无产阶级贫困议题深嵌唯物史观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脉络核心。故海德格尔断言,马克思的社会异化批判那一向度恰恰是极具理论高度的,与人类解放命运分享着共同的内容:消除异化成为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重大理论分野,因为异化劳动是致贫的谋生活动。^[1]

在此还要澄清两种错误思潮,因为它们作为理论顽疾瓦解着解决贫困问题的任何企图。一种是否定任何救济方式,因为贫困是人类永恒样态。如富兰克林认为,《济贫法》的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不愿劳动的原因,“他所指的制度,是向穷人提供一定救济的《济贫法》”,即“富兰克林意识到,要建立雇佣劳动制,一定程度的贫困是必要的”;^[2]李嘉图的态度则更为明确,认为济贫法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切贫民都能确实得到扶助,人人生活都得安适,则按由学理推论,这种赋税的繁重,怕会驾在其他各种赋税总和之上。救济法的作用,使富强变为贫弱,使劳动的努力仅仅为了生计,使智能优劣的界限紊乱,使人类心灵,为满足肉欲而不绝忙碌,最后,使一切阶级陷于贫困”;^[3]马尔萨斯的观点尤为激进,认为济贫法不能解决人口激增的问题,反而使整个国家陷入困境,因为“根除贫困超越了人类的能力范围”,^[4]这样的实践后果是,以他的人口论作为设计蓝图,资本家颁布了新的救济法,^[5]等等。他们意在说明,贫困是资本进步的直接体现,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代价;假如没有贫困,那么无产阶级就道德堕落与人性乖张,那么资本家则丧失了劳动力来源,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必然受到阻碍。

另一种,贫困是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那么是否如技术批评者所言,现代技术或机器进步导致了无产阶级贫困化。他们坚信无产阶级因被机器技术淘汰而导致分工化贫困。如,黑格尔专门提及劳动抽象化问题,其背后就是机器技术的抽象化导致了人被机器所取代的问题,“劳动的抽象化与满足的具体化”的矛盾关系导致了片面化的社会分工,它带来劳动者被机器取代而导致贫困问题,“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6]卡尔·洛维特认为,生产力发展导致了技术致贫,“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7]海尔布隆纳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厄运是,它创造出了超越其社会制度掌控能力的生产技术机构”。^[8]显然,这些技术批评者们坚信是技术导致了贫困。显而易见,他们并未看到技术生产背后资本致贫的实质,只抓住了技术致贫的肤浅表象。

总之,这两大问题所隐含的判断都一样,都认为贫困作为人类缺陷或技术附庸是无法根治的。换言之,人类解放作为一项未竟事业成为乌托邦式的想象,被禁锢于资本生产方式而难以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反贫困以何种形式深嵌人类解放事业

就解决难度而言,贫困问题是人类发展史难以解决的顽疾之一。有一种误解颇为流行且迷惑至深:人类解放就是经济解放、政治解放与人性解放的多元综合。假如将之贯彻到底的话,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误判:现代解放论等同于资本创造论、人类解放论是资本解放人类论。前面已提及,这种误解容易幻象化为以资本终结任何未来发展的图景。如,黑格尔以精神哲学论证了这种历史终结论,将历史原则划定在精神或理念的范围内;弗朗西斯·福山将这种终结论转化为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主张,企图以此证实资本主义制度是现代世界最为完美的社会制度等。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顽疾之一的贫困问题,无论是黑格尔还是福山都将之归结为社会悬置的议题,“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9]如何把握与解决贫困问题,成为他们的理论空场。故资产阶级思想家

们只看到资本的文明性,有意淡化其否定性。换言之,大多数思想家们只关注财富的增长问题,注重实现资本层面的“富国裕民”的制度设计,而忽视反贫困视域中的人类解放议题。

因此,资产阶级的解放实验是有历史限度的,以致马克思批判当时的普鲁士王朝时,讽刺当时的政治改革只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10]就革命效果而言,资产阶级革命使得人的解放成为一种历史命运,却封闭了人类解放的任何可能。

(一) 资本生产与人的解放的社会协同

资本所有权使人身依附关系中伦理实体之人变成了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原子个人,“人们(Mensch)当然是平等的,但他们仅仅作为人(Person),即在他们的占有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11]财产的占有是现代世界的平等本质。换言之,财富的占有才使得人的解放成为社会化运动,那么与人的现代属性相关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精神才有可能。

黑格尔的解放观体现了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反思高度,其中《法哲学原理》对解放的理解颇为重要,也代表了黑格尔关于解放的理解。他认为,解放是人的自我意志或任性(特殊的自由意志)转向社会化的普遍性过程。^[12]虽然“这种解放是形式的”,因为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中人的解放的必然性内容,但由于“社会状况趋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无穷尽的殊多化和细致化”,这必然导致社会需要与满足的矛盾:奢侈与贫困的对峙是难以消除的,^[13]即人的解放出现了“两难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的解放理论有几点比较重要,值得揣摩:其解放思考并未站在贫困阶级的立场上,必然有意识地淡化这一阶层;已注意劳动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异化阻力;其目的不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而是依附于绝对精神的人的解放等。这些思考其实从社会制度的视角考察了人的解放问题,激活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重新设想。^[14]

(二) 贫困生产与应对机制的差异理解

传统社会存在等级贫困与绝对贫困,这种贫困现实是由物质财富贫瘠以及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引发的。工业革命与机械化生产,使得资本具有了征服世界的革命能力,新的生产方式与革命方式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以前的高度依附的人身关系,变成了以劳动能力换取生活资料的生存方式。由此贫困形成是由于生产资料受资本调节,变成了一种相对贫困,即现代世界中的贫困是相对贫困。

如何解决相对贫困,不同思想家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分野: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是由于懒惰等人性缺陷造成的,故诸如约翰夫·汤森、威廉·坦普尔、洛克等认为,应该让无产阶级的后代尽早劳动,以解决生存问题,减轻社会压力,如洛克呼吁孩子在3岁的“成熟年龄”就可以开始工作;^[15]另一种观点认为,贫困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致,这种看法主要包括弗莱彻、哈奇森、斯密、李嘉图、贝克莱等人,他们认为“永久化的奴役是他们最好的命运”,“逼迫他们对国家的财富做出更大贡献”。^[16]

同样,尽管伊格尔顿看到,“贯穿人类历史的是物质的匮乏、强迫劳役、暴力和剥削”,但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不是传统世界的绝对贫困,而是资本剥削所导致的新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故其论断无疑是错误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文明都是以它们为基础建立的”;^[17]同时很容易得出一种悲观性的结论:贫困问题本身是无解的,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遥不可及。那么,面对社会形态的本质变迁,思想史也会有三种反馈:资本创造财富,经济活动为财富增长提供了“富国裕民”的科学规律;资本形成现代政治,政治活动为资本发展提供了公民解放的条件;资本创造解放前景,空想社会主义将解放限定在私有财产的共有化之路上。

但问题在于,它们并未意识到人类解放如何超越资本社会的复杂性矛盾问题,换言之,只是抓住

了资本的某一种内容加以肯定或否定,并未真正切入现代世界的问题核心。换言之,在资产阶级的理论视域内,人类解放只是资本增殖向度上的财富解放,那么无产阶级失去财富的样态就成为“科学议题”的边缘内容。

(三)理论反思与历史批判的矛盾对峙

第一个真正以历史视角进入反贫困视域的是黑格尔。尽管黑格尔的结论是,贫困问题作为现代性的症候是无解的,但黑格尔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对19世纪初黑格尔的一些著作的研究表明,他那时已经深刻思考过工业社会增长与物质和精神贫困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思考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深度,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先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18]这值得学界关注。

如,黑格尔区分了占有与收入之间的区别,以剖析现代贫困的本质属性。占有是法权意义上的,而收入是市民社会之中的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即占有其实就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收入是在市民社会生存中获取的,二者有本质差异——占有是现代世界的平等来源。在黑格尔这,收入多寡或有无属于市民社会领域,因为失去收入的贫困者是社会调整的产物。黑格尔只侧重资本创造财富的宏大叙事,却淡化了无产阶级的收入缺失(不正义的分配)的现实。但黑格尔已经注意到,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分配本身并不能带来全面发展之可能。

再比如,尽管黑格尔无法提出财富生产与贱民贫困之间矛盾的解决路径,但他已经意识到贱民贫困的历史生成内容:现代分工体系与生产关系容易形成贫困与贱民。以此观点对话其他观点,则立分高下。如,近代功利主义以抽象的“最大幸福论”取代“利己主义”的“最大利润论”,以此掩饰贫困的生成说明。换言之,贫困与贱民的形成是与集体幸福原则相悖的,是这些贫困者受过度欲望驱使而失去最大幸福的效用,“幸福便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而促进幸福便是判定一切人类行为的检验标准了”,故“真正说来人们欲求的唯有幸福”。^[19]但功利主义者们并未看到,幸福问题不仅仅是一种体验性的效用,更是根植于社会化运动之中的。简言之,黑格尔否定了任何以集体或社会为名的考察方式,直接回归至历史批判视域,但问题在于他以思辨形式考察了贫困与贱民,而并未面向社会现实,即现代生产制度造就了现代贫困。

总之,这些思考本身并未真正澄清反贫困与人类解放的内在关联,而是将之归结为人类的不完善的人性结构或社会管理机制。与之相对,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角,揭示反贫困作为一种历史性议题,如何深嵌在人类解放的叙事结构之中,即它们协同推进且彼此互动:马克思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两大方面予以解读,直接论证了反贫困深嵌在人类解放事业之中,证实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二、反贫困的理论聚焦: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进路

马克思将谋求人类解放作为毕生事业,一直孜孜以求。反贫困直接聚焦了人类解放的现实批判与未来图景,成为马克思终身研究的对象。可以明确的是,他在《莱茵报》时期用“人民理性”去质问“自由精神”,转向关注穷人利益。由于“物质利益困惑”,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的批判,一直到《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包括后来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完成了人类解放与反贫困关系的原则定位与研究设计。

(一)反贫困哲学的解放设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明确,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是物质利益矛盾的社会结果,同时提出无产阶级反对贫困的哲学方式,即“心”(无产阶级)与“脑”(无产阶级哲学)的辩证运动,即哲学批判

需要无产阶级作为物质武器,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新哲学作为精神武器。具体而言,马克思已经转至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特别是抓住了现代性的“副产品”——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颠覆与反抗现代性世界的根本力量,也是人类解放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20]简言之,它们是完成反贫困与人类解放的革命主体。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人类解放为系统议题,为读者展示了其反贫困的问题意识与初步思考。一方面,以异化劳动为内容的贫困样态。异化劳动导致了无产阶级贫困,这种贫困样态就是谋生活动:失去产品而贫困、劳动过程被剥削而贫困、人的本质丧失而贫困、社会关系扭曲的贫困等四种贫困样态。另一方面,以扬弃异化劳动为内容的消灭贫困路径。马克思提出,通过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来完成消灭贫困的历史重任。什么叫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就是利用私有财产发展财富的同时,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类解放。这种解放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反之亦然,“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21]因此,青年马克思的反贫困更加侧重于哲学批判视域。

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已经注重异化生产、财富统治与无产阶级贫困之间的经济学研究。如,详细考察三者的矛盾现象:一是财富衰弱时,工人的相对贫困加剧,深受贫困折磨;二是财富增长时,工人从事奴隶劳动,但依然摆脱不了劳动过度与饿死的命运;三是财富增长稳定时,工人贫困处于相对状态的顶峰。因此马克思判断,“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22]简言之,无产阶级的贫困是现代社会的必然样态,那么追问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就成为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议题——为什么无产阶级必须进入资本积累的系统之中呢?此时马克思以哲学作答,由于无产阶级从事的是谋生劳动或异化劳动而致贫,“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3]这样的考察内容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开辟了准确的研究道路。

(二)反贫困哲学的对象聚焦

尽管思想史对贫困有过碎片化的反思,但这些反思都游离于贫困的外部现象,不能准确把握贫困形成的对象内容。马克思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吸收前人的反贫困思考,甄别他们有关反贫困问题的得与失,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工厂统计学与黑格尔的贫困理论等;其二,收集与整理官方文件,佐证贫困现实,如《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工厂视察员报告》《公共卫生报告》《总结报告》《皇家铁道委员会报告》《泰晤士报》等;其三,与恩格斯等人进入工厂调研,掌握大量的无产阶级贫困素材。这三大方面使得马克思从对无产阶级贫困现象的外部考察,转入对贫困成因的本质批判。

首先,考察贫困的方式不再局限于人性论批判。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们侧重于对无产阶级的贫困成因的讨论,将之归结为无产者自身的道德堕落与人性缺陷。如,马尔萨斯认为,贫困是由于人口的繁殖力,导致食物供给不足,而人口膨胀的原因是由道德堕落引起的,^[24]故贫困难以消除,“消除下等社会阶层的贫困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老实说,贫困对社会成员的压迫,乃是一种顽疾,并非人类智慧所能根除”^[25]等。类似的观点很多,它们的共性在于没有看到贫困生成的社会机制,而将贫困反思归结为人性论批判。马克思认为贫困考察应该回到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如《资本论》及其手稿大量举证了资本如何致贫的现实。

其次,贫困成型的考察视角转换。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直接从劳资交往转到劳动生产,放弃了关于贫困的外部分析。如韦克菲尔德认为,穷人在劳资交往过程中,应该处于“自然被奴役的状态”,

任何提高工资的措施都无助于贫困的解决,反而将问题引向了城市,加剧了城市的负担,这与斯密、李嘉图,包括马尔萨斯等的观点非常类似。原因在于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只是从劳资交往过程出发,但仍然以工人贫困作为基本代价,为资本增殖提供“科学规律”。究其本质,它们对资本合理化加以论证,进而避开劳资对立的矛盾说明。与之相对,马克思直接从劳动者的视角考察了资本增殖与贫困生成的关系,从原则高度上把握资本存在必然以无产阶级贫困化作为基础,即贫困生产过程是资本剥削过程。如,很多经济学家将机器作为劳资关系和谐化的重要内容,正如马克思所批判,“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26]再比如,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积累是为“富国裕民”的断言,其实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机制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27]无限增加贫困的生产者数量。

最后,贫困塑造的社会矛盾确立。黑格尔的贫困理论对马克思影响非常大。马克思细致研读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肯定了后者关于贱民思考的重要意义;同时,将贱民直接定位为无产阶级,提出了解放向度的反贫困议题,“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28]马克思进而提出,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本质区别,确认了人类解放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他们“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29]那么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一方面回到社会运行机制的批判,即现代资本造就了无产阶级贫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反贫困不能简单依赖于法律约束或道德批判,而是走向自我革命,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的向度上提出反贫困的终极诉求,“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30]简言之,马克思的反贫困主体是无产阶级,且反贫困途径是消灭现代资本制度——它们直接贯通着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研究,成为人类解放的核心内容。

正如恩格斯所言,“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31]故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扭转了致贫过程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贫困不再是国家层面的边缘现象,而源自市民社会中物质利益的复杂矛盾运动——反贫困是新世界观指导下的批判进路。无产阶级贫困化现实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所赋予的人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环节,需要在反贫困中加以扬弃。

(三)反贫困哲学的全面呈现

《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都直接证实了人类解放与消灭贫困的内在关联。黑格尔也提及解放问题,但是他的解放是绝对精神中的解放环节。绝对精神的运动环节中必定不会有贫困的位置,即贫困在他那只是情绪或意志的主观缺失,而非绝对对精神的客观内容。黑格尔提出,贫困形成于不劳动的情感或情绪,“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32]贱民就是不劳动以及有消极化情绪的无产者。那么,在黑格尔这,贫困与贱民问题变成了以待扬弃的情绪化主体精神。如何扬弃之,黑格尔认为可以通过诸如同业公会、殖民事业与社会救济等方式来解决。故只要没有达到对现代资本的批判,黑格尔依然停留于资产阶级的保守视域。

与之相对,马克思的反贫困直接面向资本现实。《资本论》提出了贫困成因、运动与扩张等规律。首先,现代贫困形成于资本及其逻辑。假如仅仅看到贫困现象,则无法真正切入现代世界。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致贫的现象,其实质在于资本如何通过商品化过程导致无产阶级形成,即形成“一无所有”

且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同时,资本占有劳动力而不是简单占有劳动,目的是占有劳动者的剩余生产能力,即剩余劳动。简言之,资本致贫是一个生产过程的主体性事件,它不断变换、转换劳动力与剩余价值的关系,改变着贫困程度,以满足自己的增殖需要。

其次,贫困程度受资本构成的严重影响。马克思特别通过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来标识贫困程度问题。不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不变的资本部分,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目的与归宿;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变化的资本部分。资本积累需要一方面通过绝对扩大劳动力商品量即扩大支配剩余生产的劳动者数量,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获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相对减少劳动力使用,以绝对增加不变资本,促逼更多无产阶级变为“产业后备军”。因此,不变资本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绝对形式;它不断将剩余价值转换为生产资料,进而无限压低无产阶级的生活资料;可变资本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相对形式,“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33]就是资本增殖的扩大化:它通过市场化调节来控制无产阶级贫困的相对性。再比如,马克思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问题,当技术构成提高时,无产阶级的产业后备军规模进一步加大,那么无产阶级贫困化就无限加剧。

最后,彻底解决贫困在于消灭资本、实现人类解放。《资本论》及其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关注这样的议题:资本主义并非人类发展的终点,因为资本带来的不是整体性富裕,而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贫困现实,“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34]因此,人类解放必须解决贫困问题。一是解决社会贫困,重建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个人生活资料的全面丰裕与按需分配;二是解决个人贫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决贫困的最终表现是,消灭异化劳动与自发分工,全面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人成为自由发展的个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5]

总之,马克思的反贫困最终指向人类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了诸多实践性环节,如对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共时贫困与历时贫困、贫困生产与贫困积累,以及结构贫困与系统贫困等的超越与扬弃。这些问题只有真正厘清与超越扬弃,才能为人类解放提供现实基础与方向指导。换言之,反贫困哲学赋予了人类解放的问题向度:一是人类解放不是哪个人的解放,它不是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原子个人解放;二是人类解放不是哪个阶级的解放,它不是以剩余劳动为占有机制的统治阶级的解放;三是人类解放不是物质财富的机械性扩张,它不是以财富生产最大化为唯一标准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提供超越贫困的具体内容,以实现人类解放之可能。

三、反贫困的时代聚焦:资本致贫批判与人类解放向度

那么,贫困是进步的代价还是进步的环节?对此一直有激烈的争论。很多思想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认为贫困是社会进步的必要环节,能为社会全面富裕提供基础。如斯密认为贫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社会分工的积极后果。但正如迈克尔·佩罗曼所批评的那样,“斯密在这段话中完全没有对工人人们的状况表示关心。相反,他所关心的是对富人的福利的威胁”;^[36]当然还有浪漫主义的反思,认为贫困牺牲了大部分成员的利益,是社会进步的痛苦代价。如,卢梭所坚信的“现代文明使人进步,但使人类堕落”的看法,至今颇具思想穿透力。无论代价论还是进步论,只要没有上升至人类解放的高度,就只是贫困现象的理论说明。故需要厘清资本致贫的建构内容,才能赋予人类解放的超越向度与实践进路。

(一)超越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

现代资本主义所达到的解放是人的类解放,即如卢梭所言,现代性世界中人不断得以解放,但是

作为人类却不断堕落。资本塑造了现代性世界,终结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绝对贫困。一方面,资本瓦解了“人身依附关系下的贫困样态”;另一方面,资本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进而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绝对贫困状态。但问题在于,资本生产并未带来人类解放的基础内容,却塑造了新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悖论问题。

绝对贫困是无产阶级由于资本全面控制生产资料而“一无所有”,即绝对贫困是无产阶级失去生产资料而极度贫困;^[37]相对贫困是由资本的生产积累制度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相对游离于资本引发的。这种相对贫困,不是相对于资本的财富积累而言,而是相对于工资的调节机制来说。如,随着资本的有机构成的质的变化,导致了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那么工资受资本调节导致工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38]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想要同时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问题,就不能仅仅依靠于提高就业人口的工资或对失业人口进行救济等方式。《资本论》认为,应从导致两大贫困问题的社会生产机制入手,在扬弃资本的同时,通过生产分配的方式加以调节。因此,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问题的路径就是,在颠覆资本带来的绝对贫困的同时,以按需分配为原则,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财富生产力不再是历史限制,且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或异化方式,而是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9]

(二)否定共时贫困与历时贫困

贫困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属于历史难题。斯密试图论证贫困是市场经济的破坏性阻力,惧怕无产阶级所蕴含的消灭贫困的革命潜力。同时,他将贫困的来源归结为社会分工及其与无产者能力匹配的问题,以说明无产阶级贫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而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共性现象,即共时贫困是历史永恒样态。那么,消解贫困只能依靠不断进步的市场自由或市场资本主义本身。正如佩罗曼所言,斯密鼓吹高工资,即“市场的和谐运作,会有利于工人的利益”,是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制度设计;^[40]而黑格尔的贫困理论则将贫困看作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顽疾,同时也是历史难以解决的困境;马尔萨斯直接面向贫困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认为历史进程、人口增长与贫困形成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故他企图绕开历史制约性,直接提出“能否在不产生罪恶和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的增殖力,从而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一种均衡状态”。^[41]简言之,他们都以历史的普遍性视角考察贫困,并将之普遍化为历史顽疾,但没有看到贫困本身的历史性特质,即现代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贫困形式与内容,即共时贫困而非历时贫困。

那么,人类解放就不是简单地解决历时贫困或面向一般意义上的贫困问题,否则容易滑向浪漫主义批判或激进主义批判之路,反而认为贫困是无解的。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需要彻底解决共时贫困问题(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必定能解决历时贫困问题(历史普遍性贫困),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史以来最为完备的生产体制,形成了最残酷却最隐蔽的致贫机制。由此,只要解决资本时代的共时贫困问题,那么历史进程中的所有贫困现象都将“迎刃而解”。

(三)消灭贫困生产与贫困积累

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工人的工资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提高。资本扩大财富生产的同时,提高了工人工资,实现了资本与工人的“和谐发展”——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化,必然最终解决工人贫困问题。正

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42]这种看法没有澄清贫困生产与贫困积累及其致贫能力:贫困生产是资本生产过程必然带来的结果,体现为资本致贫的经济权力,是对无产阶级生产的强制权,“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43]贫困生产是为资本主义生产财富,不断生产出庞大的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贫困积累。简言之,两者共同固化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样态。

蒲鲁东看到贫困的“坏的方面”,坚信只要消除它,就可以实现小资产阶级的“共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未看到贫困所蕴含的革命潜能,即蒲鲁东“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44]。进而言之,蒲鲁东不可能理解贫困生产与贫困积累的现实划分与革命动力:贫困生产是财富生产的积累制度,它生产出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同时,贫困积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因,是它们完成人类解放的革命内容。两者共同聚焦为贫困化的无产阶级是颠覆世界、消灭资本的革命力量。因此,诸如卢梭的“人类起源的不平等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论”批判、蒲鲁东的“所有权就是盗窃”批判、拉萨尔的“劳动资料批判”^[45]等,都没有理解现代世界的贫困生产与贫困积累的实质。故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判断,即马克思认为贫困生产与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所造就的,那么贫困批判应该回到资本生产与积累的消灭之路。

(四)扬弃系统贫困与结构贫困

系统贫困直接聚焦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系统性地生产贫困;同时系统贫困深嵌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变成了一种固化的结构贫困。纵观资本主义发展,主要有四大结构贫困:工人贫困、生态贫困、精神贫困与全球贫困等。但马克思对贫困的批判,不仅停留于结构贫困本身的理论分析,还对形成结构贫困的系统贫困加以严格澄清与批判——资本生产导致了系统贫困,系统贫困又固化为结构贫困,严重阻碍了人类解放之可能。

因此,很多思想家很喜欢以统计学视角考察贫困的发生问题。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例证。再比如,舒尔茨以统计学的方式,研究过生产运动^[46]与贫困形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专制而恣意的价格等级制度——与之相关的是一种专制而恣意的职业声誉等级制度,数量最多的工人阶级因此在经济上和道德上被压低——因此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正义和非正义”,^[47]这种生产运动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等级制度、产生了贫困问题。正如格拉布所评判的那样,“他的困境首先在于,尽管他一方面尖锐地批判在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剥削所造成的贫困;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他,却没有认识到贫困的原因是根植于依靠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48]。因此统计学研究有其优势,即能够直接给读者展示贫困问题及现象,更能直观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如贫富差距、人口激增、贫困程度、管理失范等现象。但问题在于,它们不能深度把握住这些结构贫困背后的系统贫困,即资本生产积累致贫的系统性内容。

只有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剖析了现代社会的系统贫困。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行结构的贫困改良,而是整个社会系统机制的贫困变革。那么,马克思反贫困就明确聚焦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现两大系统性的扬弃颠覆:资本生产关系颠覆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生活资料个人化占有的新形态;异化生活世界颠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脱了谋生方式的生活内容。换言之,消灭资本关联着系统贫困的彻底解决,并直接瓦解结构贫困的社会成因。

四、结 语

以上讨论从原则高度澄清了,人类解放不是必然性进程中的理论预设,而是无产阶级反贫困运动

的历史过程。换言之,人类解放假如没有根本解决世界贫困问题,那么它只是一种超越历史的理论预设。尽管现代世界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它们高度掩饰了资本剥削致贫的现实,如金融资本、数字资本、大数据主义、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兴起。但有一个基本判断:只要没有脱离资本剥削的社会系统,这些新技术仍然严格从属于资本增殖的社会性质,不可能真正改善无产阶级贫困,^[49]也不可能实现人类解放。简言之,纵观现代反贫困,只要没有上升至人类解放与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那么只能停滞于解决贫困现象,诸如物质财富短缺、权利资源分配不均、生活资料不足等。只有马克思以反贫困哲学为原则高度,把握贫困解决、资本批判与人类解放的本质关联,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向度。

注释:

[1][10][20][21][22][23][28][29][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14、17、185、122、130、16-17、14、17页。

[2][15][16][36][40][英]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5-306、8、8、203、207页。

[3][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4][24][25][41][英]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杨菊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5、11、34、15页。

[5]新济贫法取消一切救济,只是培训失业工人,这样的习艺所被称之为“济贫法巴士底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7页。

[6][9][11][12][13][3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10、245、58、208、208、244页。

[7][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07页。

[8][美]罗伯特·L.海耳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14]黑格尔的贫困理论对马克思的反贫困哲学起到了一定理论激活作用,可参见周露平:《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理论的批判性超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7][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18][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19][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7、46页。

[26][27][33][34][38][42][4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7、710、354、344、734、735、359页。

[31][35][39][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7、566、436、20页。

[37]传统社会的绝对贫困是由于生产力限制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整个社会都处于财富极度贫乏的绝对贫困;资本主义时代是新的绝对贫困,它是由于资本占有制而导致的贫困样态。故两者的发生原因与表现形式迥异。

[45]拉萨尔派所制定的《德国工人党纲领》,认为“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土地也是重要的劳动资料,土地所有者参与到剥削无产阶级,具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1页。

[46]舒尔茨用了大量统计学数据,说明了物质生产运动的具体情况,他称之为价格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职业声誉等级制度,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47][48][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7、203页。

[49]尽管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责任编辑:刘 鏊]